

我

萧黎 主编

的史学观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卷首絮语

在许多家出版社把眼睛只盯在钱的时候，九二年夏秋之交，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庄昭先生、历史编辑室主任辛朝毅先生来鸿，邀我主编《我的史学观》一书，感慨很多。

我国是一个有优良治史传统的国家。套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司历史的女神——克丽奥特别钟情于中国人。因而长期以来，我国历史典籍之丰，撰述水平之高，治史人材之众，史学影响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的，就是克丽奥女神的故乡也是难以匹敌的。这不是狂言，而是历史事实。当然，如果用今人之眼光来审视，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其历史并不久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之后，中国历史学有了质的突破，特别是在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外史学长期隔绝的状况有所改变，中国的史学家重新“睁眼看世界”。这不仅扩大了视野，调整了思维定势，也使中国的史学界能够在世界史学之林中寻找、确立自己的位置和坐标。在如此的机遇和挑战中，更加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尤其是近十几年，在史学界老、中、青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大批有建树的著作，无论是通史还是专史，无论是国别史还是断代史，无论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著还是许许多多言简意赅的论文，其研究之广度、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这么说，尽管这四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境况也是风风雨雨，惨淡经营，也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仍以自己的成就和影响，证明了中国历史学在发展、在前进。这是史学界的共识。然而，四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却没有出版过题名为《我的

史学观》的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回想在那极“左”路线盛行的日子里，大到政治立场观点，小到穿衣吃饭，无不连着“纲”和“线”，人被压抑、扭曲着，个人的价值更是不能言及。那时，人群分左、中、右，思想世界观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不允许有个人的看法、个人的观点，即使有也只能深藏在心中，没有可能来谈谈“我的史学观”。这种无“我”的悲哀，一直笼罩着史学界。直到1978年，史学家才挣脱了思想枷锁，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认识到了自我的存在、自我的价值。于是，他们又在史学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自由地、辛勤地耕耘着。他们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地形成了不同的治史风格和史学观。也就是在如此的氛围和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出版《我的史学观》。“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从《我的史学观》一书的出版，也可折射出今日中国大地的安定、祥和。

所谓史学观，简而言之，就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学本身的总体认识。它的内涵也是极其广泛的，如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学的对象、性质、功能，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也包括历史学家的研究手段、研究成果的评估及史学家的主体能动性和局限性等等。史学观的内容如此丰富，要想在万把字的篇幅里全面地、深刻地阐述清楚，自然是很困难的事情。记得王安石在《咏石榴花》诗中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于是，我拟了七八个具体题目，供各位史学家参考。

本书邀请了海内外30多位中国史学家，并建议他们题目自定，写法自由，不拘一格，但要写出自己认为最值得写的，谈出自己最想谈的内容。尽管这些史学家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不同的治史风格，甚至有不同的史学观，但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通过自己和全体史学界的同仁的努力，把中国的历史学从过去的繁荣推向未来的繁荣。这是中国史学家的责任感。因此，在各位作者的通力合作下，《我的史学观》现已

同读者见面了。作为主编，作为第一读者，真有企盼多年终成夙愿之后的激动，并浮想联翩。

《我的史学观》，不是我们的，更不是中国史学家群体的史学观，而是写出了每一位史学家的个性来，不人云亦云，敢于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读竟全书，受益匪浅，感触良多，乃欣然撮述诸文要点，置于卷首，或有助于读者一览本书之旨。

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过程是什么？为什么史学家会有不同的史学观？这样的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也困扰着一些史学界的同仁。秦汉史专家、对史学理论素有研究的林甘泉先生认为：“史学从记述、实证到诠释，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和提高的过程。记述和实证可以复原历史过程的某些现象，但历史的本质、价值和规律只有通过诠释才能得到说明。历史的诠释反映了一个史学家的历史观，所谓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对立，通常就是在历史认识的这个层次上表现出来的。”文字不长，却令人深思。对这个问题，元史学者、中国政治制度史专家白钢先生认识独到，他说：“把在廓清历史真相后，经思维过程到理性概括，称之为史学家的悟性。”在此基础上他又论述了怎样才能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他认为：“悟性的价值取向，往往通过史学家的研究视角的选择体现出来；而研究视角的选择或确立，又取决于史学家对于历史本质的理解。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研究有益于社会的功能。”中国史学史专家、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的瞿林东先生，对史学批评做了清晰的论述。他认为，史学批评是史学自身调节并最终促进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史学批评对史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有三个方：促进史学理论的发展；扩大史学的社会影响；拾遗补阙，匡正谬误。

历史科学是人类反省自身历史的科学。作为历史学家，更应该认真地反省自己的工作。这是因为，反思是人类为了进取的一种需要。作为有责任感的中国史学家，则应站得更高一点，看得

更远一点，想得更深一点，自我批判的精神更强一点。这是时代和社会赋予历史学家的特殊的天职。因此，对四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反思，是很多史学家都论述到的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过去往往把学术观点说成是立场问题，在学术讨论中强调解决政治立场问题。长期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苏双碧先生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史学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历史，而这里讲的“立场”，主要是指“世界观方面，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分析问题，对问题有个正确的判断”，并不等同于政治立场。没有深刻的反思，不解决史学家头脑中的疑虑，“双百”方针的贯彻，历史学的繁荣，都将会是一句空话。史学家手中的笔，不仅是解剖历史的一把刀，也应是解剖自己的一把刀。清史专家、现又倡导并致力于社会史研究的冯尔康先生，在文中以犀利的文字解剖了史学家的局限，指出造成这种局限有时代的、阶级的、政治的、史料和知识结构诸方面的因素。他指出，要克服政治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局限性，史学家不要以今人的观念、立场苛求于古人；对古代颂今非古的传统不宜简单地继承，要做分析；更不要把历史学当作现实政策的注脚。在如何估价当前中国历史学这一宏观问题时，年轻史学家都提出了坦率的想法。明清史专家、并对史学理论有研究的赵世瑜先生认为，中国史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仍然经受着政治的、经济的猛烈冲击而摇摆，再加上史学家自身的种种原因，而使中国历史学仍然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先秦史专家、并对史学理论有研究的王和先生在谈到如何培养历史感时说，要破除史学家那种非得要有一种万能的理论模式的支持才能达到平衡的心态，树立以现代的批判精神为主要特征的新观念。这些看法不能不令史学界同仁深思。中国古代史、政治思想史专家刘泽华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的坎坷历程，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反思并不是否定过去，否定自己，否定一切。反思是为了未来。

在即将告别 20 世纪、迎接 21 世纪到来之际，作为史学家应该如何看待 20 世纪？近代思想史专家、对史学理论有所建树的姜义华先生认为：“20 世纪所提供的生产力、交往形式、知识信息等历史资源，几乎超过了以往全部世纪提供历史资源的总和。因此，对 20 世纪做出深刻的反省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这一代人神圣的职责，因而也是当代史学的首要课题。”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青年学者胡逢祥先生对重塑历史学的社会形象，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总之，收入本书的文字，不论作者是老一辈的史学家还是中青年史学家，也不论是侧重于对中国史学的过去的反思还是着眼于对当前和今后的见解，都令人思考、回味。

作为主编，作为第一读者，在拜读了这些用汗水、泪水、心血凝成的文字，就被那真挚的感情所打动，不时流下热泪。无论是理性的探寻还是心灵的记录，都体现了中国史学家人生的甘苦、不倦的追求，犹如一首唐诗所云：“山色不厌远，我行随处深。”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在文中，把个人的感情与史学的社会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人深刻地理解到，历史著作的选题也是从现实出发，有感而发。试想，没有十年“文革”的切肤之痛，没有“从死地走一回”的感受，王先生也就不会把荡涤封建专制主义作为一个时期的主攻方向，也就不会写出诸如《“株连九族”考》、《万岁考》、《烧书考》等惊世之作。他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史学家，他的脉搏，应当与时代、人民的脉搏跳动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的心声、触动时代敏感神经的作品。”

中国现代史专家魏宏运先生为了编撰《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一书，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调查访问，收集所得两千余万字，许多都是鲜为人知的宝贵资料。这种求知的精神，体

现了史学家的一种追求。

思想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就思想史研究与史学观的关系提了一家之言；著名的先秦史专家李学勤先生在《大发现时代的史学》一文中，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看法；中国近代史专家龚书铎先生认为，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就必须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把近代中国文化放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来研究；兼通中外历史的专家刘家和先生以答客问的形式，对史学的经世致用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清史专家王思治先生结合治清史的经验，阐发了历史与史学的关系；孙中山研究专家张磊先生结合孙中山研究专题论述了历史科学从理论到表现形式都须变革的必要性；世界史专家朱寰先生、马克尧先生结合具体问题，就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中国近代史专家吴伦霓霞先生从对香港史的研究讲到了治史经验；文化史专家耿云志先生、冯天瑜先生对治史的各个方面作了理性的探讨；秦汉史专家安作璋先生、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振江先生、民族史专家周伟洲先生，对史学家应具备的素质和“德才学识”做出了当代意义上的阐释；西方史学专家张广智先生就如何正确对待西方史学遗产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看法；清史专家李治亭先生长期致力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历史传记的写作，他在文中把自己的实践做了理论上的提炼；历史地理学专家葛剑雄先生把写出真实的历史作为永恒的追求，表明中年史学家治史的严谨态度；清史专家华立先生就察古知今与求真求实，道出了她治史的心迹。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台北的庄练先生的文章，反映了他独辟蹊径，以掌故文字把其渊博的知识献给大众，为历史的通俗化和普及做出了贡献。

由于各位史学家都是从各自最熟悉、最擅长的领域入手，故都道出了肺腑之言，给读者一片真诚和颇多启迪。

令人遗憾的是，白寿彝、胡厚宣、周一良、史念海、田余庆、戴逸、宁可、张椿年、林剑鸣、陈铁健等先生或因身体欠佳，或

因工作繁忙未能撰述。但是各位先生也都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敬意！

主编这本书，虽然是一个尝试，但却给人以启示：史学观并不是一种专利。每一位史学家都可以、也应该总结阐述自己的史学观点，不要总是仰视前人，更不必拜倒在前人的脚下；要敢于站在前人或巨人的肩上，坦率而负责地阐述自己的史学观。一般说来，中国史学界没有什么流派，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走向繁荣过程中的一个缺憾。收入本书的各位史学家的史学观，表面看来大同小异，但细细揣摩一下，并不完全雷同，甚或大有不同，可谓“百家齐鸣”。我想，在如此宽松的社会环境里，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史学家继续努力求索，立足于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就有可能在总的方向、总的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出现、形成各种史学流派，中国的史学将会更上一层楼。这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全面论述个人史学观的专著能早日问世。

肖 黎

草于北京

目 录

(以年龄大小为序)

中国现代史研究大有可为	魏宏运 (1)
生死书丛老蠹鱼	
——我写掌故文字的经验谈	庄 练 (11)
开展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发展世界史	
学科的重要途径	朱 寰 (24)
史学功能与史学修养	安作璋 (39)
漫谈思想史研究与史观	张岂之 (53)
关于史学致用的对话	刘家和 (62)
文化与社会	龚书铎 (77)
历史与史学	王思治 (86)
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	林甘泉 (99)
在比较中更深入地研究世界古代的历史	马克尧 (114)
我的史学观	张 磊 (126)
大发现时代的史学	李学勤 (138)
史学理论三题	苏双碧 (144)
最重要的是时间的检验	冯尔康 (158)
从“我”说起	刘泽华 (172)
史学·史家与时代	陈振江 (190)
今古何妨一线牵	王春瑜 (200)
心曲三题说史学	瞿林东 (207)
历史能给我们什么?	耿云志 (216)
二十世纪:当代史学的首要课题	姜义华 (229)

宏阔·意远·国际化

——寻求克丽奥的永恒魅力 张广智 (241)

上穷碧落下黄泉 白 钢 (255)

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 周伟洲 (264)

历史人物论 李治亭 (278)

学史随想录(四则) 冯天瑜 (293)

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 葛剑雄 (307)

历史感、史学心态与知识更新 王 和 (321)

略论香港史研究 吴伦霓霞 (333)

察古知今与求真求实

——治史心迹 华 立 (341)

我们需要重塑历史学的社会形象 胡逢祥 (351)

“中体西用”:过渡时期中国史学之我见 赵世瑜 (365)

中国现代史研究大有可为

魏宏运

魏宏运，男，陕西长安人，1925年2月10日生，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史学会理事长，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主要著作有《史可法》、《南昌起义》、《孙中山年谱》、《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主编有《中国现代史稿》、《简明中国通史》、《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中国现代史大事记》、《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发表的论文有60余篇。

我涉足中国现代史，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开始的。那时社会上受旧观念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起码得研究明清以前的，认为现代史谁都知道，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我选择方向时，也曾现代史和古代史之间徘徊犹豫过。搞了几年古代史，对南明史感兴趣，还写了一些文章。但相比之下，中国现代史对我的吸引

力更大，感到这一领域非常辽阔，只要辛勤耕耘，就可丰收。历史研究总是要看得远一些，深一些，不能停留在现象和表面上。我阅读各种史书，尽可能多的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上了马列主义夜校。虽以现代史为方向，但并不把知识局限于现代史领域。郑天挺、雷海宗两先生还特别给我和其他两位年青伙伴补了古代史课，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

研究现代史和研究其他问题一样，是建立在丰厚的资料基础上的。不掌握史料，就是无米之炊。图书馆、档案馆和书店是汲取养料的场所。50年代初，旧书摊特别多，北京东安市场、琉璃厂、天津劝业场楼上，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北京东安市场，我还为学校买到一整套海关册、北洋政府公报和解放前出版的有关现代史的书刊，我读书的兴趣就更加浓厚。知识来自不断的学习，从图书资料和典籍文献中探求，效法前辈史学家优良学风，耳濡目染，逐渐地也懂得了如何收集资料，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思辨和探索问题。

今日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报刊、各种政府公报和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书信、日记是最能反映当时现实的。像《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等历史悠久的报刊，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尽管其报道不是自觉的，观点也不一定恰当，但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面貌、思潮和趋势及其产生的背景，可以发现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事实。凡历史研究范围内的诸多问题，如军事、政治、农业、工业、科学、文艺、生产技术、宗教、人口以及风俗习惯等，都有记载。旧中国人民的辛酸苦难，民族的屈辱，革命的曲折，都会映入眼帘。在我的生活中，我把大部分时间和乐趣放在翻阅旧的报刊上。50年代翻阅天津人民图书馆馆藏的京津泰晤士报是我星期日最大的享受。

开始进入史料世界，脑海里是模糊不清的，接触多了，将各

种史料贯穿起来，精心构思，对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就有了清晰的轮廓。

我写文章，喜欢查阅报刊，如撰写关于孙中山的一些文章，关于五四时期周恩来的一些文章，关于八一南昌起义、关于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关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文章，都从报刊中吸取了养料。举例来说，在天津读了《益世报》和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在北京读了《新闻报》，在武汉读了《民国日报》，这些报纸的有关记载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了对1927年武汉政府的一些看法，从中了解到那时的社会变迁，阶级关系的演变，政府政策上的失误，以及活跃于这一历史时期有关人物的表现。对历史变迁中各种因素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逐步思考深入，很自然地，就把经过思考的东西执笔记录下来。我撰写的北伐时期工农大军在解放两湖和江西战争中的作用、汉得英租界的收回、北伐时两湖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1927年南昌武汉之争的实质、1927年武汉政府的北伐、1927年蒋介石集团对武汉政府的颠覆活动、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是怎样走向反动的、1927年武汉政府为什么不去镇压蒋介石的叛变等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

各种报刊都有自己的背景和不同的倾向，这是可以看出来的，引用报刊资料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和判断能力，不能以稀为贵。

如果有可能，条件允许的话，还应该去发掘公报、书信和日记中的材料，这可以增加所论证问题的说服力。我所写的《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一文，主要根据周恩来给其表兄式周两封信和觉悟社成员之间的信，没有这些信件是无法下笔的。衡量研究水平深度之一，是作者是否使用了独特的史料和可靠的事实。对研究者来说，发现材料是一件大事。材料是客观存在的，但发掘出来，加以新的解释，则另须一番功夫，使论述有活力。

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并不是向社会提供一大堆无头无绪的史

料。当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应进行分析和比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判断出原始资料的代表性与可靠性，决不可以纯客观地照搬出来。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交织在一起的事物，那么，史料所反映的内容也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审视史料时，要精细的考察，周详的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史比古代史更复杂，仅就政治势力来看，就相当的多，每一势力都有自己的喉舌和宣传工具，共产党的，国民党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地方实力派的，都应翻阅，其中必然有不确切的，使用时就需要排除出去。即使是档案资料，也不能无批判地看待，同样要用求实态度去处理。

历史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记载的典籍文献。遇到无文字史料可据时，就应把已证明是可靠的有价值的口头资料记录下来，以弥补史料的不足，这也是历史赋予现代史研究者的独特使命和有利条件。

口头历史的收集，有助于对研究的问题作出有历史深度的开掘。它所以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创造历史的人没有时间去写历史。当然也有许多回忆录出版，但这毕竟是有限的，此其一。第二，旧中国岁月多半处于战争状态，兵荒马乱，许多资料毁于战争。第三，在残酷的战争中，很多事实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第四，人为销毁文字资料，也不在少数。如国民党军队占领根据地，毁了一些；日本投降时，伪满洲国国务长官武部六藏下令销毁日本侵华的许多罪证，集中在承德的资料，烧了两天两夜，在大连焚毁的则更多。

这些年来，我的兴趣集中于抗日根据地和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调查研究上。我和我的同事走出大城市，走出自己的书斋，到社会上去寻找知识，利用口头历史，积累了大量资料。抗日战争年代逝去还不算太久，经历过那轰轰烈烈时代的人，现在还大有人在，他们的口述，给我们留下了生动而真实的历史。把没有记

载过的东西，载入史册，或者使沉睡的史料重见天日，这是丰富祖国文化遗产的事业。当然口述历史的质量不等，有的显得支离破碎，甚至因记忆模糊，枝节上有出入，因此必须多方核对，加工整理，使其确凿无误。

在财政部科研所组织领导下，我曾主编过两部大型资料。一部是《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共四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为此，我们曾走访过原晋察冀边区许多地方，访问了当年创造边区的许多人，收集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许多刊物如《调查研究》、《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边政导报》和《冀热边政报》等，在大学的图书馆是找不到的。我们收集的军工资料，更是难能可贵。那全部是从来没有文字记载的，因为在当时环境下是绝密的。我们访问了原晋察冀军区工业部部长刘再三和与军事工业直接有关的干部与工人，才弄清楚军事工业的发展状况，记录下来他们的业绩。商业贸易资料，也不容易发现，也是口头历史帮了忙。我们访问山西忻县时，很庆幸的遇见该地区财政局局长韩成贵，他原在晋察冀从事商业贸易工作，对当时的商情、隐蔽的商号以及秘密的贸易路线了如指掌，这就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和提供了线索。而我们这位抗日时的勇士在提供资料时，总是诚恳淳朴的笑笑，在他个人看来这是很平常的事，而对我们来说，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发现，我们解开了根据地商业的奥秘，从而商业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另一部大型资料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两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我们除日常进行资料的收集外，还大队人马专程走访了邯郸、武安、涉县、黎城、左权、武乡、沁县、沁源等地，足迹踏遍这一广大根据地区域。资料的收集，从地方档案馆、陈列馆直至个人手中，凡是能够找的地方都找了，共收集到2000多万字。涉县文管所拥有的资料尤为丰富，《边区政报》、《边府通讯》、《太行工业》在这里可以

找到大部分。左权县保存有大量农村调查资料；沁源陈列馆则展有太岳区出版的报刊。每到一地，总有各种座谈会和单独访问活动，对根据地时期的政策、社会状况、人民生活、集市贸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一一询问，直到搞清楚为止。调查的范围逐日扩大，研究的兴趣也就日益浓厚。实地调查访问，使我们更感到这一作法是现代史研究者必修的一门课程，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

调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极重要的。我因主编这两部大型资料和撰写这方面的书，参加过不少当年革命领导者的有关座谈会。例如1984年戎子和在太原召集的会议，邀请前晋冀鲁豫边区局长、行长、处长、专员等共同回忆并总结抗战时期该地区财经工作的得失与发展。在这次会议中，我获得了不少当时农业、工业、商业、进出口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对当时的政策思想，我从下面的一件事也得到启发。1941年太行区的公粮重了一点，农民叫苦，影响所及，黎城县秋粮征收时曾发生过一次离封道暴乱投敌事件，其原因之一是借口公粮重，负担不起。这是一件大事，很复杂，故我矛盾搅在一起。据当时担任边区副主席的戎子和讲，对离封道采取了镇压方针；但也接受了这一教训，从1942年起，就着手减轻人民的负担。

许多事实告诉我，搞现代史的人得置身于现代史的回忆和一些不断的总结中，这比仅仅阅读几本书要深刻得多。不能认为读了几本现代史的书，就是懂了现代史。学海无涯，研究历史不仅要有广泛的一般性知识，还要熟悉各个领域的一般知识。调查研究是扩大知识面的好方法，并且使人具有开拓性，可以得到第一手资料。有些问题，不通过调查，不看实际的例证，就不能了解。我们是在华北农村调查中，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的。翻阅档案、报纸、县志和家谱等资料，倾听各方面人士的口述，才弄清了一个一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农村政权的演变、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工商业的状况、集市贸易、人口变动、家族制度

和乡土文化等，一个一个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样对一个地区的历史，或一个村庄的历史，就有了概括的记录。通过这样典型的调查，可以领会人类文明是怎样发展的，同样也能够理解民族的凝聚力为什么那样强而有力。

举例来说，对冀东滦南一个家族的调查，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问题。该地区王官寨是明朝初年王文进由安徽宣城县豪泊村迁来定居而逐渐形成的村落。王姓一代又一代的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着生活着，成了一个大家族。尽管到1936年已17代了，但对其始迁祖仍怀念不忘，始迁祖的坟墓也最大。王姓家族有着一种牢固的向心力，一家有事，街坊邻居就来帮忙。抗日战争后，家族影响力逐渐衰落。以姓为村，这是北方村落的普遍现象，与王官寨相邻的张各庄、霍各庄、汪庄、周庄、刘庄等，都是以姓为村，“各”字即古音的家字。原来这一地区比较荒凉，人口稀少，经过数百年的人口繁衍，生产发展，才形成今天这个样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他们历经天灾人祸，痛苦与磨难，但还是坚持了下来，每一姓对自己的门第都感到自豪。

我们曾在顺义县调查了沙井村50年来物质文明的变化，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切都在变，有时缓慢，有时急进。与以往的历史相比，变化可不小。以前全村除一两家是砖瓦房外，其余全是土坯草房，而现在已找不到草房了，尽是砖瓦平房，或楼房，建筑得很漂亮，窗户是玻璃的，屋内地面是洋灰的，床也代替了炕。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不再织布缝衣做鞋制袜，日常生活用品都到市场上去买。从60年代开始，电灯代替了煤油灯，几千年来所使用的磨子与碾子也成为历史遗迹，沉重的木犁为拖拉机所取代，水井被填平了，家家都在用自来水。全村共有400多亩地，只由7个人来承包，耕作是机械化。这样的村庄占中国农村的百分比是多少，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已迈出了前进的步伐，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